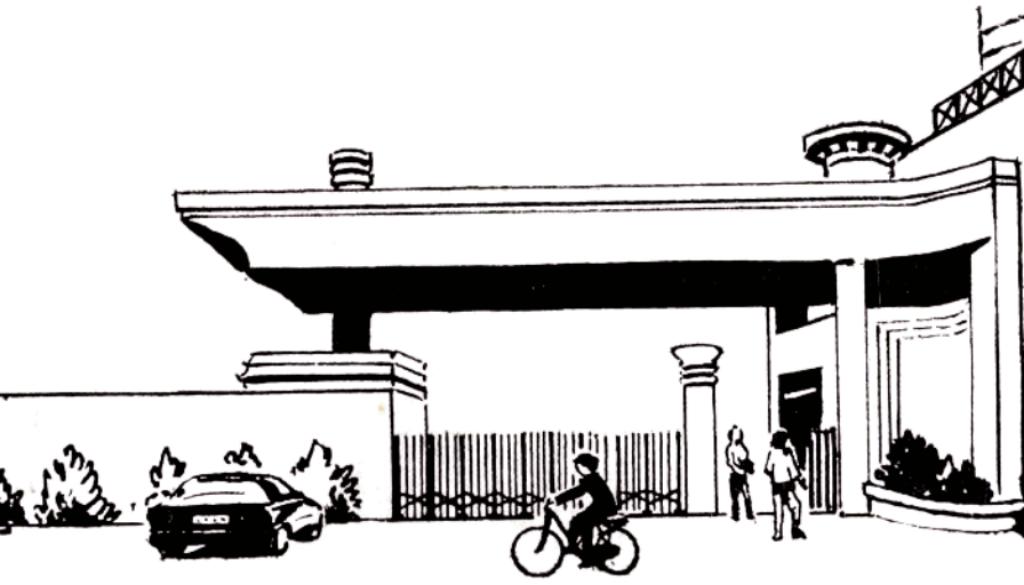


龙南文史资料

第六辑



龙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录

(一)

我县近代教育的发展.....	廖彩雄(1)
对建国后龙南教育事业的回顾.....	蔡宪銮(6)
民主革命时期龙南党的负责人与教育	
.....	蔡宪銮、菊辉、启达(12)
抗日战争时期的龙南师范	江西省龙南师范史编写组(17)
我所知道的龙南中学	廖光厚(25)
不断前进 办出特色	
——龙南县第二中学办学 21 年	钟汉灵、廖瑞彦(31)
前进中的龙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龙南职专编写组(36)
开辟足洞教育基地的回忆	袁石福(38)
龙南县富坑耕读学校记事	林家仁(41)
九连山花吐芬芳	
——全县第一所农村初中办学记	赖观扬(47)
龙南镇小变迁	袁大仁(51)
一所历史悠久“三风”俱佳的学校	记江(54)
龙南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	
——龙南江东廖氏文通中学办学记实	
.....	廖瑞彦、廖光位、廖彩景(58)
解放初期龙南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	唐瑞英(63)
私塾与育人	赖观扬(65)
集资助学的荫黉社	赖观扬(67)

(二)

钟 仙

——龙南第一位进士 赖观夫(68)

钟振超

——以“芋宴”招待同僚的知州 廖彩烈(70)

上天不负苦心人

——记龙南籍侨美人士赖正亮先生 廖彩烈(73)

悠悠师生情

——记蔡健老师 王显桃(78)

有志者事竟成

——记勤奋六十多年的大学校长廖西白先生 廖瑞彦(85)

唐茂宣老师的英文小诗 廖彩雄(88)
悼欧阳和老师 廖彩雄(90)

客家教育热心人 赖观扬(91)
廖世平先生与“锄云国学专修馆” 廖瑞彦(93)
叶显濂老师逝世四周年纪念 廖彩雄(97)

(三)

- 新潮涌动的龙师 王显炎(99)
忆龙中学生反郭培师学潮 廖瑞滨(103)
记一次两个小学联合抗日旅行宣传 蔡宪銮(109)
龙师轶事两桩 廖瑞滨(112)
龙师校园拾零 王显炎(115)

(四)

《警报铭》及其来历	廖彩雄(118)
旧时督学制度	钟汉灵(120)
“十七字令”寓三笑	廖彩雄(123)
锄云诗钞	廖瑞彦(125)

附：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龙南县第十届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公告	(128)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龙南县第十届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公告	(129)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龙南县第十一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公告	(130)
政协龙南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131)
编者的话	133

我县近代教育的发展

廖彩雄

我县自南唐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建县迄今,千余年间,人文蔚盛,代有俊彦,文绪绵绵不坠,教育不断发展。宋元祐三年(1088年),县令许彦光在城内集贤坊修建县学、儒学、书院代有修葺扩充。及至明清时代,私塾已相当普遍。封建社会以科举取士,入学生员人数有限制。清代,“龙南属大学,岁试文武童生各取入学一十五名,增广生额二十名,廪膳生额二十名”。私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列强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鸦片战争后,打破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格局,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门户开放和洋务运动,又使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清末,我国有志之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和革命先驱孙中山,为唤起民众,振兴中华,先后发动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开创了我国近代历史的新纪元。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又把我国文化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为教育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我县近代教育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兴起发展的。

一、废科举,兴学堂,这是我县近代教育的历史性变革。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年),光绪帝接受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政治需要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变法主张,推行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维新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在教育方面来说,首先是推出了废科举、兴学堂的主张。戊戌变法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我县城内办起了一所公办“和志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令“停科举以广学校”之后,私立“江东学堂”、“启智学堂”、“立志”、“都陂”等小学堂相继创立。

废科举,兴学堂,这是我国近代教育的一场革命。(一)从教育宗旨看,明清时代办学是为了“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因此,“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学为忠臣、清官”。戊戌变法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学部颁布的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辛亥革命后,废除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提倡公民道德教育。民国四年(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提出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实利、尚武,以道德为经,实利、尚武为纬”。(二)从教学内容看,私塾只开文科,以读书、写字、作文章为主。当时私塾分蒙馆和经馆二种。蒙馆以“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言杂字”为教材。经馆以“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书》、《易》、《礼记》、《春秋》)、“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为教材。学堂除了开设文科课程外,还增设了“格致”、“算术”、“图画”、“体操”等课程。这样,学生学习的课程,掌握的知识均较为全面实用了。(三)从教学方法看,私塾以个别点教为主,以注入式为基本教学方法。学堂则改个别点教为课堂教学形式,教学方法也有较大改进。

二、民国时期,私立学校崛起,中等教育和成人社会教育创立,把我县近代教育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辛亥革命后,学堂改称为学校。我县人民办学的热情十分高涨,许多姓氏利用公堂族款办学,也有合股集资办学。抗日战争前夕,我县私立学校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城内有江东、尚真、建中、致良、爱春、达人、开明等十余所私立小学。郊

区有都陂、金钩、水西等私立小学。据有关资料统计，民国十七年（1928年）我县私立小学有：颖川、致良、扶桑、震东、龙南、真道、尚德、江东、爱春、尚真、都陂、桃溪、达人、狮山、育良、成美、育英、洒源、水西、里仁、上蒙、象塘、东安等23所，学生人数达到1806人。又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统计，我县城关私立小学仍有“尚真、龙南、致良、达人、江东、晓星、桃溪、建中、三育、开明、颖川、爱春”等12所，学生人数1000余人。因此，人民群众办学，在我县初等教育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影响是深远的。在此期间，公办学校还是尝试性的。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以后，县府才开始在各区乡设立中心小学，各保设保立小学，办学经费由政府统筹。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下半年，所有公立小学改称国民学校。

随着小学教育的迅速发展，我县中等教育和专业教育创办较早，发展较快。民国十年（1921年）“私立岭北初级中学”在县城当铺创办，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龙定全安四县联立乡村师范学校”在县城考棚创办，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龙南县立初级中学”开办，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增设高中班，招收龙、定、全三县初中毕业生，成为三南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以后，我县又增办了“私立中华初级工业职业学校”、“私立文通初级中学”和“私立颖川初级中学”。解放前夕，全县有完中一所，初中一所，中专（师范）一所，初技一所。中等教育的发展，为我县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人才。

民国时期，我县中小学教育已初具规模，男童入学率不断提高。解放前夕（1949年），全县小学160所，在校学生达到8377人。中学、中专（师范）、初技共4所，在校学生741人。

民国时期,推行社会教育,对失学民众施以补习教育,实行征学制,强迫入学。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全县有63所小学兼办成人班,其中妇女班185个,已入学人数达到31,798人。但是,真正脱盲的人数不多,全县70%以上的青壮年仍是文盲半文盲。

三、建国后,我县教育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教育,振兴学校,我县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小学教育,根据教育部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于1952年对全县小学进行了普查,制订整顿工作计划,克服了办学工作中盲目冒进和教学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为小学教育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九五八年,全县基本达到村村有小学,在校学生达到20,567人。一九六四年,全县有完小三十六所,初小二百二十五所,在校学生23,967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8.37%。中学教育,解放初政府接管了“龙南县立中学”,1952年接办了“私立文通初级中学”,改名为“龙南县第二中学”。1954年,龙南中学和龙南第二中学合并,在校学生达到1854人(其中高中467人,初中1387人)。1957年后,先后在杨村、里仁、渡江、临江、汶龙、南亨、九连山、安基山增设了初中。1961年撤销了九连山、南亨、安基山初中,同年创办了龙南镇、渡江民办初中。至1966年,全县有完中一所,农村初中五所,民办初中二所,在校学生达到2556人。建国后,我县专业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不断发展。专业教育方面,1958年,江西共产主义大学九连山分校、龙南县工业交通技校、龙南县卫生学校、龙南县农技学校、各公社农业中学相继创办。1960年,共大安基山分校,1964年,共大足洞分校创办。这些专业

学校,为我县工农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有初、中级技术的实用人才。成人业余教育方面,解放初,以扫除青壮年文盲为主要对象,在全县农村普遍建立了冬学,并在冬学的基础上设立了常年性的农民夜校。1952年推广速成识字法,掀起了群众性识字高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文革”期间,我县中小学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和干扰。学制缩短,开门办学,县工宣队进驻学校。农村放下中农管理学校,教师下放工厂农村。1969年,提出“上小学不出生产队,上初中不出大队,上高中不出公社”的口号,致使全县中小学急剧增加,教师随意凑合,教育教学质量低劣。

粉碎“四人邦”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中共中央制订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使我县教育事业蓬勃发展。1985年,我县小学262所,在校学生36,647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以上,成为全省首批普及初等教育县,并发给了合格证书;中学24所,在校学生10,953人。1983年,我县青壮年总数为96,030人,非文盲数为90,516人,无盲率为94.2%,经地区验收确认我县为基本无盲单位。1995年,经省检查验收,我县为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合格县。1986年开始,我县多方筹集资金,对全县中小学校舍全面进行了改造,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1986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1994年,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年,国家先后颁布了《教师法》和《教育法》。教育法规的颁布实施,促进了我县教育事业沿着正规化、科学化、法制化道路健康向前发展。

(注:廖彩雄系原任龙南县教育局局长)

对建国后龙南教育事业的回顾

蔡 宪 鑫

新中国建立50年来，龙南的教育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重视下，基本上是健康发展和成长的，但也出现过几次大调整和失误，笔者试图在本文中作一历史回顾，认识确否，供教育战线的同仁们研究时参考。

一、建国初期必要的教育大调整

1949年8月19日，龙南解放了。在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繁重任务中，龙南的驻军和刚成立的县委、县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对全县教育事业的接受和改造，抓得很紧，驻军143师的政治部，派出干部深入中学和师范等学校，启发和串连原校的教职员，抓紧新学年的开学准备工作。县人民政府，把当年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派往各小学任教；学校的名称统一更改，将原国民学校（保学）一律改为村学，以地为名。9月上旬，全县城乡中小学，95%以上的学校按时开学上课，教材原则上采用各校原订购的国民党时期的统编课本，仅废除原公民课，将公民课时暂改上时事政策课，内容取材于省、地党报和新华书店的有关活页文选。对私立中华职校，因无经费，无生源，与原校教职员商定停办，愿改行自谋职业者可自谋职业，愿留下从事教育者，调县城各中小学。私立文通中学和4所私立小学保留，教学上要求与公办中、小学相同。原龙南中学的杨村分校，解放初期停办，原老生转至县城中学插班。为了不断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知识

水平,解放初期至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前,即 1950 年初至 1953 年约 4 年中,每年的寒暑假,都要集中全县中、小学教职员举办教师学习班。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高中教师 1952 年暑假在省,初中教师在地区集训。

建国初期,在全面抓好普通中小学教育的同时,还开始试办学前教育(幼儿园)、县城职工业余教育和农村的成年扫盲识字教育。根据“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加上土改后的翻身农民,渴求学到初步的文化科学知识的欲望,1950 年冬兴办冬学,1951 年开始试办青壮年民校,从此,扫盲识字班遍布农村,80% 以上的青壮年文盲积极参加扫盲班学习。农村广大小学教师,白天在校教孩子,晚上下村教育壮年文盲,每天的工作长达 10—12 小时。政治上翻了身的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在广大勤劳朴实的农民影响下,人人精神焕发,工作积极努力,无人叫苦叫累。

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从 1953 年开始至 1959 年,全县中、小学教师,虽然停止了寒假学习班,但每年暑假还要集中在县城受训 4 个星期。整个五十年代的寒暑假教师学习班,全部学员和工作人员,集中膳宿,学员学习刻苦认真,每期都取得了政治、业务双丰收。

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1953 年,教育部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建国初期我县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健康发展。

毛泽东同志 1957 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大跃进的 1958 年,

他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普通中、小学试办小工厂、小农场，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把书本知识和劳动技能相结合。这个时期还相继开办了半工半读的共大分校。五十年代的中学生，每年都有下乡参加义务劳动的时间。学生接触社会、接触实际较多，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了提高。随着人口的增长，相继在杨村、里仁、临江、渡江等地办了初中，减低了县城中学的招生压力，扩大了初中招生数字，方便了农村青少年上初中。

从 1955 年至 1959 年，龙南师范叶显濂创造的“日光显微幻灯”，在生物教学中得到推广应用。次年，龙中钟世杰，创制了“太阳灶”，被中央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1959 年，里仁初中廖振房创制成功“感应式电话机”，在校内使用。上述教师创造发明，都是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情况下获得成功。

三、“左”的政策对教师队伍的影响

党在不同时期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同样波及到教育战线。1957 年的“整风反右”，1966 年夏开始的“十年动乱”，校园出现波涛，教师队伍受到冲击。

1957 年党内整风反右，暑假教师训练班开始学习。在寒假学习班上，形成了挖右派的“热潮”，全县有 77 名小学教师被错划右派。在 1958 年的小教暑假训练班上，专门召开了一次右派会议，对右派提出了两条出路，一条是自愿申请退职回家，领取退职工资后停发工资；一条是申请下放安基山垦殖场，领取生活费。结果有近三分之一的错划右派的教师办了离开教育岗位的退职手续。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红卫兵”冲出校园，“杀向”社会，各校被迫停课，让位于学生闹“革命”。各校领导和骨干教师大部份被揪斗，分别打成“三反份子”、“反动学术权威”、“黑帮、黑线”人物。在“三查”和打“反共救国军”运动中，全县近半数的学校教师下放农村劳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的政策推动下，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错划右派的摘掉了帽子，收回安排了工作，去掉了“老九”的臭名。可惜那些教育战线的有用之材，经过十多年或二十年遗弃，丧失了风华正茂的出力时机，收回没做几年工作就退休离岗了。

四、两度拔苗助长的失误

1958年，在“三面红旗”的错误指引下，教育战线也来了一次“拔苗助长式的‘大跃进’”。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入大专院校。在满足不了高校招生的需要时，又将春季刚刚升入高三的在校生，提前半年毕业，大部份送入高校。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许多新办高校，在调整中下马停办，那些在高校就读一年或一年半的新生，又被纷纷遣送回乡务农。

1968年，因高校停招新生，全部中学毕业生都下放农村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后的数年，高、初中招生时不通过考试录取，而采取层层推荐入学的办法。新生入学不问学业成绩多少分，只看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致使许多有基础深造的好苗子，丧失升学深造的时机。

在“7·30”指示的误导下，一度出现了“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离公社”的村村办完小、社社有中学的遍地开花局面，美其名曰方便了贫下中农子女就近入学，减轻了农村

家长的经济负担。自 1971 年到 1976 年,全县完全中学达到 15 所(含 2 所高中),初中 19 所,小学戴帽附设初中的“五·七”学校 31 所。完小发展到 160 所。
教师队伍呢?因 1968 年下放了近半数的教师,根据“7·30”指示,中学以“三·三”制改为“二·二”制,小学将原来的“四·二”制改为五年一贯制,减少了三分之一的中学师资需求量和六分之一的小学师资需求量。在 1973 年虽然收回了全部脱钩下放农村的中小学教师,仍不适应于高中教师的需求,只好采取就地取材,层层拔高的办法应付,初中教师调到完中任高中课,小学高年级教师调到初中任教师,小学低年级教师任高年级的课,小学低年级教师大量缺员则采取当地推荐民办教师的办法来解决。至 1975 年止,全县有中学教师 429 人,小学教师 1497 人,其中民办教师就有 722 人,民办和代课教师约占一半。

“文革”时期的十年中,学校数量虽然增加了,但由于停止了高考招生,中学只搞推荐入学,学生人数却减少了。一时间,“读书无用论”充斥社会,教学质量显著下降,“三机”代替了物理,英语课已被取消,政治课被“梁效”的“左”文所代替。

五、改革开放,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腾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全面落实政策,纠正历史上出现过的错误。对广大知识分子,明确了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7 年底恢复了全国的高考招生制度。1978 年,恢复了重点中学的名义,经过几年的调整,全县的教育事业,象党的各项事业一样,健康茁壮地向前发展,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读书风气急趋好转。

20 多年来,党和政府首先对学校网点设置进行了必要的

调整，新办了第二中学，撤销了农村高中，撤并了农村初中，撤掉了高小戴帽的‘五七’学校，办起了职业中学和实验小学；加大了教育投入，把 20 年前农村最破烂的房屋是学校的状况，改变为最漂亮的房舍是学校，高中和初中的理化仪器电教图书设备不断充实；师资力量不断充实加强，民办教师通过多种途径培训和考试，95% 已逐步转为公办教师；近五年来，在县关工委的配合下，对中小学学生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校、家庭、社会融为一体，为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作了不懈的努力。

但在大好形势下的 1993 年，在全县精简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中，在教育战线也出现过硬性套引行政单位的退养措施，把 55 名中学骨干教师，不论在教学上是否有用之材，一律“退养”，其中 10 几名高中骨干教师很快就被广东一些县市的中学聘用，成了人家的掌上明珠。在龙南中学，不得不启用教学经验尚不够丰富的年轻教师充当各科的把关教师，致使有几年龙南的高考成绩受到一定影响。

实践证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随着县内经济的腾飞，教育投入力度的加大，硬件建设的加强，全县教育战线园丁们的辛勤耕耘，已摘取了全省无盲县的桂冠，基本实现了“普九”义务教育的目标。全县在校学生人数，已达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进入新的世纪，展现新的前景，龙南的教育事业，前程是光辉美好的。

（作者身份：副县级退休干部，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县老校校长，中级技术职称）

民主革命时期龙南党的负责人与教育

蔡宪銮 菊 灿 启 达

在民主革命时期，龙南先后有几位革命领导者，以教书职业作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工作，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为龙南的革命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本文介绍几位党的负责人与教育的情况。

一、廖献之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活动。

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军，赶走了军阀孙传芳的部队，进占了赣南重镇——赣州镇。是年冬，中共秘密党员朱由坚和陈赞贤先后到赣州，成立了中共赣州特别支部。特支为了培训赣南工农运动的骨干，以赣州总工会的名义在赣州开办了“赣南农工运动训练班”，培训热血青年。当时，龙南寨背的廖光泮（号献之）正在省赣四中毕业班读书。在革命大潮的影响下，他宁愿放弃领取中学毕业证书的机会，报名参加了“赣南农工运动训练班”学习。同时被廖邀入该班学习的龙南籍进步青年有廖子贞、杨桂曦、徐世和、赖玉衡等人。

在一个多月的培训过程中，他们相继公开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临结业前，取得优秀学习成绩的廖献之等52名学员，都先后被秘密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廖献之在赣南农工运动训练班结业后，中共赣南特委派其回县工作。同时回县工作的还有几位龙南籍的学员。临行前，特委交待他们完成三项任务：第一，改组国民党县党部。第二，大力开展工农运动，支援北伐战争。第三，培养积极分子，秘密发展中共党员，伺机建立龙南县的党组

织。陈赞贤还特别嘱托：要以公开的职业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廖献之等人回县后，通过亲友关系，相继受聘于县城各私立小学当教员。当时县内尚无公办学校，廖献之为江东小学国文教员，兼毕业班的英语教员；赖玉衡、廖子贞、徐世和、杨桂曦也分别在县城及郊区各私立小学任教。

几个月的时间，龙南的工农运动轰轰烈烈，相继成立了县总工会，县工农联合纠察队，县农协筹备处。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也相继成立。中共龙南特支也于4月秘密建成。

廖献之在学校认真备课，国文教学中，特别注意对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尤为突出的是作文教学，用《妇女如何才能解放》、《劳苦大众的使命》、《读书的目的》等政治鲜明的题目，启发学生向往革命的思维，激发学生救国救民的热情。对学生的作文，精细批改，不但篇批而且眉批和段批。“三八”节和“五一”节，还带领学生用他们自己的文章出特刊和墙报。县里召开“陈赞贤烈士殉难追悼会”和“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会，他不但参与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还亲自在大会上发言，带领学生在会后举行庆祝游行，振臂高呼革命口号。

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7月中旬，赣南成立了清党委员会，以张辅邦为连长的清党军一连进入三南。清党军一进入龙南，立即查封了县总工会和农协筹备处机关，收缴工农联合纠察队的武器，搜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面对白色恐怖的形势，廖献之及时在临江召开了会议。会上发表了控诉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告全县人民书》，布置了革命分子立即隐蔽转移的任务。会后，连夜赶到定南老城，安排定南的工农运动骨干转移工作。

1932年春，国民党剿共的军用飞机一架迫降龙南检尸坝